
“众擎易举、各出所藏”： 近代上海合众图书馆的合众机制探析

沈菊霞¹ 刘桂桃²

(1.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, 湖北武汉 430074;

2. 湖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, 湖北黄石 435002)

【摘要】近代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为叶揆初、张元济和顾廷龙合作组建,自1939年创办至1953年转交政府,短短十四年间已取得非常成就,在业内及公众间享有盛誉。其内在原因,在于图书馆自创办之初就形成良好之“合众”机制。这一机制不仅存在于发起时“众擎易举、各出所藏”的命名之义,更在于创设人以志向、专业与交谊为基础的合众基础,将图书馆专业管理、特色收藏与创设人影响力相结合的制度基础。虽为私立图书馆,却在创办及发展的过程中聚合众力,赢得学界及公众信任,担当起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角色。

【关键词】 上海合众图书馆; 合众机制

【中图分类号】 G25

【文献标识码】 A

【文章编号】 1009-4733(2016)06-0063-05

doi: 10.3969/j.issn.1009-4733.2016.06.015

近代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在近代中国图书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。作为一家私立图书馆,它创办于抗日战争之沦陷上海。在时局动荡的不利形势下,历时十余年,从“空无一人、空无一物”^[1]发展至拥有25万册藏书、15000种金石拓片的著名公共图书馆,以历史文献馆收藏知著于当时,且深受诸多学界知名人士的盛赞及公众之认可,不能不说是图书馆史上之一大奇迹。学界关于合众图书馆的创办过程及叶揆初、张元济及顾廷龙等三位创办人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,梳理了合众图书馆成立的历史脉络,也充分肯定了三位创办人的贡献。不过,其中也存有缺憾,在分述创办人贡献之时,对于合众图书馆的“合众”机制还缺乏深层认识。合众图书馆命名为“合众”,并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合众的优势,这是其在战乱时世中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。^[2]本文拟从合众图书馆的报刊史料及创办人之文集、回忆录等,对其合众机制作一探析。

一、合众之基：创设人的志业、交谊与分工

1937年11月,日军攻陷上海,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沦为孤岛。在日军肆虐的艰难时期,本不适合创办图书馆一类之文化事业,但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反于1939年5月发起筹备,并于1941年正式成立。^[3]图书馆有三位公认发起人,即李景葵、张元济、陈陶遗,其中李、张为实际发起人,陈陶遗在地方上享有盛誉。顾廷龙是李景葵、张元济后来聘请的图书馆专家,亦为创设人和实际管理人。图书馆的实际工作,主要是由叶景葵、张元济和顾廷龙三位创设人在统筹组织。

【收稿日期】 2016-09-08

【作者简介】 沈菊霞,女,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;刘桂桃,女,湖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资料员。

合众图书馆能创建于非常之时，成非常之事，非依天时，而赖人力，三位创设人原各有本业，叶景葵为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，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长，顾廷龙原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，但为成立图书馆，三人逐步达成共识，各展所长，既为图书馆立基础，也为之订制度、谋远略。

在战乱之中创办图书馆，在于救中国文化，谋国故之保存，维民族之精神，是创设人共同的志业。首先提议创办图书馆的是叶景葵，叶为知名实业家、银行家，曾任汉冶萍公司经理、浙路股款清算处主任等职。在1915年创办浙江兴业银行，后任董事长，在实业界及社会上富有盛名。李氏家富收藏，也爱好文史，与文化界人士张元济等诸人交厚，李氏藏书也是后来合众图书馆的最初收藏。在1937年11月，叶景葵致函张元济，提出欲创办一图书馆。到1939年春，他在写给顾廷龙的信函明确提出创办图书馆，“弟因鉴于古籍沦亡，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，政潮暗淡，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，私人更无论矣。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。”叶诚意邀请顾南下主事，“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需要编纂校勘人才，吾兄愿意图南否”^[4]叶知顾之名是因阅读过其著述，对其在图书馆管理及编纂方面的专业才能极为信任，因而力邀加入合众，以开蓝缕。在4月致函中，明确提出：“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（彼在江苏声望极隆）三人为发起人，即为委员。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，其下设总编纂一人，请吾兄作任之。”^[5]邀请极具诚意，总编纂一职，实为图书馆业务之主管，所有图书馆收藏整理编目出版诸事，一身以系之。换言之，顾是否加入创设，也直接关系到图书馆之成败，没有核心的业务主持者，诸多事务难以开展。

张元济作为著名的出版家，也积极为成立图书馆奔走费力。在上海沦陷后，叶离开上海，其家居及收藏托张元济代为管理，张极尽心力。对于叶景葵提出创办图书馆之议，深表赞同。商务本身曾办有东方图书馆，惜毁于战火。他也极为看重顾廷龙的专业能力。在1939年5月，张元济亦亲致函顾廷龙，对叶景葵创办图书馆的愿望及基础予以解释，“敝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，堪称美富。以沪上迭遭兵燹，图书馆被毁者多，思补其乏，愿出所藏，供众观览，以弟略知一二，招令襄助。”当时上海受战火影响，多所图书馆被毁，无数珍藏书籍流失，令人扼腕。叶景葵筹建图书馆，非出私心，而为保存文化典籍。张元济也深解顾廷龙的心曲，因此以创办图书馆、维护民族文化之志业相邀，“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，驾轻就熟，无与伦比。揆兄驰书奉约，亟盼惠昨。闻燕馆挽留甚切，桑下三宿，阁下自难忍焉舍去。惟燕馆为已成之局，规随不难。此间开创伊始，倘乏道师，便难措手。”燕馆为成局，规随就步，新馆为大任，筚路蓝缕。如以个人进退为依据，或视如畏途，但对嗜书成性、专业如命的人来说，担当开路者的挑战更能激发斗志。顾廷龙面对叶、张多次邀请，终谢绝燕京图书馆的挽留，南下上海，加入合众图书馆的创设团队。

顾廷龙对叶、张二人的器重和邀请极其感动，对创设合众图书馆的志业也极为认同。因此，在合众图书馆还空无一人、空无一物之时，就南下上海。在回复叶景葵的信函中，他说，“玄黄易位，典籍沦胥，有识之士，孰不慨叹！一旦承平，文献何征！及今罗搜于动后，方得保存于将来。长者深谋远虑，创建伟业，风雨鸡鸣，钦佩奚似！龙自毕业之后，自顾空疏，力持孟子不戒，不为人好为之患，遂托迹傭书，浏览适性，劳形终日，浮沉六年，茫茫前程，生也有涯，心有所怀，无以自试。”顾廷龙作为文献学专家，对于历史典籍的文化功用有更深刻的认识。战火之中，典籍遭毁，于传统文化是一大摧残。由此出发，他对叶、张二人在战时发起合众图书馆的意愿极表钦佩。合众图书馆给他个人的专业生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，信中所写“浮沉六年、茫茫前程”，难以为外人所知的困惑之中，正需要大展才学之所。对照来看，叶景葵、张元济可谓识人，张元济信中所书“燕馆为已成之局，规随不难”之句，更是打动顾廷龙的心声。顾更长记叶、张知遇之恩，“穷寐之中，得一知己，感何可言”。

^[6]

在共同志业之下，互相引为知己，三位创始人奠定良好的合作根基。在1946年报呈上海市教育局的立案申请中，对合众图书馆的办馆目的及合众之义有明确的解释。呈请中说，“窃（陶遗、景葵、元济）等当昔国军西移以后，每痛倭寇侵略之深，辄念典籍为文化所系，东南实荟萃之区，因谋国故之保存，用维民族之精神，爰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发起筹设合众图书馆于上海，拾遗补阙，为后来之征。命名合众者，取众擎易举之义，各出所藏为创。”^[7]“谋国故之保存，用维民族之精神”，合众图书馆在民族生存危机时刻诞生，其理念不仅是创设人所设，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。以此据，秉“众擎易举之义”，“各出所藏”，以创设人的良好合作为开端，集合社会众人之力，维系图书馆的发展。

三位创始人对创办图书馆的文化意义有着共同的理解，同时又各本所长，在图书馆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互补角色。叶景葵是发起人，也是主要的出资人和捐赠者。作为著名银行家，他家藏丰富，家资殷实。在1939年5月成立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后，他自捐财产10万元，加上募集财产10万元，共计20万元作为创办及常经费。资金存入银行，动息不动本。他又将家藏之书捐入馆中，是图书馆最早的一批收藏。1949年7月，顾廷龙撰《叶公揆初行状》，“己卯倭寇肆虐，公感于江浙文物摧毁之烈，谋有以保存之，约张元济、陈陶遗创设私立图书馆，首出所藏为介，名曰合众”，肯定叶首创之功。^[8]张元济为重要发起人，1941年担任图书馆董事，1946年担任图书馆董事长。他同样是图书馆的创办人和捐献者。张氏也是名门望族，收藏文献丰富。1941年，他将家藏的嘉郡先哲遗著、海盐先哲遗著、张氏先人著述及刊印之书共计935部3793册捐予图书馆。初为暂存，“冀异日敝邑或有图书馆之设，则仍以归诸故土，稍助乡邦文献之征。”^[9]后改永久捐赠。叶、张二人不仅是奠基者，而且是合众图书馆遇到困难之时，不计得失，倾心支持。叶、张二人在金融业、文化界均属声望卓著之人，也是社会知名人士，交游广阔，德高望重，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。在图书馆经费困难时，争取工商界及社会捐款，使图书馆度过最为艰难的时刻。

正是基于创办合众图书馆以保存中国文化的共同志业，一位银行家，一位出版家，一位文献学家，得以联合成众，奠定私立合众图书馆的建馆及发展根基。叶、张二人为老友，而予顾廷龙以知遇，在立馆过程中，三人结下深厚友谊，使共同的合作毫无窒碍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叶、张二人尊重信任顾廷龙的专业能力，使之能充分发挥专业才能。由此，形成叶、张主外，顾主内的人事格局。内外相维，和衷共济。

在叶景葵于1949年去世之后，张、顾二人继续主持大局。虽然合众馆在1953年交给政府，张元济在1959年去世，但顾廷龙在新的图书馆里仍然延续着合众图书馆的传统精神。1980年，顾廷龙写《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》，1985年写《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》，1987年写《我与商务印书馆》，呼吁整理张元济遗著《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》，还写《张元济访书日记辑录》。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代出版张元济书札、年谱，顾均为之作序。

二、专业与服务：私立图书馆公众信任的建立

作为私立图书馆，无论建馆、人员、经费，还是征集、整理、出版，及至检阅服务，全需自我筹集，自我设计，自我管理。但其资源，不依赖于国家财政，而是依赖于私人捐赠、公众支持。如果说创设人是图书馆的立馆之基，那么私人图书馆的公共信任如何，则是其发展之本。

首先，合众图书馆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。在创设过程中，图书馆设立了发起人会和董事会。发起人由李景葵、张元济、陈陶遗三人组成，李、张二人为实际发起人，陈陶遗在江苏声名素著，虽未实际参与事务，但可扩展合众图书馆之社会影响力。陈陶遗在清末曾参与《民报》、《醒狮周刊》的办刊，后担任过江苏同盟会分会会长，追随孙、黄，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一度担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。北京政府时期，曾担任过江苏省省长、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秘书长。因病留上海，在沦陷时期拒绝日本人拉拢，在地方士绅中素孚声望。他作为发起人，与作为银行家的李景葵、出版家的张元济共襄此举，可以增进合众图书馆的公信力。董事会由发起人组成，拥有图书馆事务的最终决断权，并承担着为图书馆筹集经费的重任。首任董事长即由陈陶遗担任，在1946年陈去世之后，由张元济担任，均为图书馆发展尽心尽力。

作为图书馆的总干事、总编纂，顾廷龙扮演着专业管理人员的角色。他能深刻体察李、张二人的办馆意旨，结合自己对于历史文献的精深研究和图书馆的工作经验，对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及专业定位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在刚刚南下受聘之时，他就拟写了《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》，意见书中对合众图书馆的使命、定位、功用有详细说明。意见书中说，“全国图书馆能照常进行者仅燕京大学图书馆一处，其他或呈停顿，或已分散，或罹劫灰，私家藏书，亦多流亡。而英美各国，乘其时会，力事搜罗，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，坐视其流散。”这与叶、张二人担心战乱破坏中国文化的立馆宗旨是相同的，图书馆，为保存文化而设。初得收藏，主要是叶氏等世家的捐赠古籍，其本人所长也在于此，所以将图书馆定位为历史文献专门图书馆。^[10]意见书还对分类编目、装订整理都提出了具体的计划。叶、张二人对顾极为信任，也将图书馆的业务管理大权交给他，至于筹集经费等事务，则由自己承担，使顾可以专心致志于图书馆内部事务。

其次，图书馆征集文献，得到社会响应。除李、张二人作为发起人有丰富捐赠外，不少学者士绅也向图书馆捐赠图书。在初创时，“是由叶揆初、张菊生、蒋挹后、陈叔通、李拔可诸人合力举办，所有书籍各有捐赠，而主要乃叶氏“卷庵”及张氏“涉园”之书。这些人士的捐赠行动得到高度赞扬，曾任职“叶、张、蒋、陈、李诸先生皆一时达识之士，能将自己家传及苦心收储之书籍，献之于众，嘉惠士林，实非浅鲜。”^[11]到1953年时，合众图书馆藏书已达25万册，金石拓片15000余种，收藏惊人，在当时已堪称奇迹。《图书季刊》发文记合众图书馆之创设，“军兴以来，江南藏书，大遭浩劫，沪滨仅获保其万一，良可痛惜，张菊生先生等有感于斯，乃邀聚士林同好，作合众图书馆之组织。征集文献，广收典籍，现已着手筹备，计划编藏，颇得各方之赞助。”^[12]发起人既立制度，又以自己交游，扩展图书馆之文献来源。这些捐赠者都与李、张等交厚，多无偿捐赠所收藏，充实合众图书馆，以存文化薪火。在图书馆担任过董事、顾问等职的人还有，徐森玉、陈叔通、李拔可、陈朵如、谢仁冰、裴延九、胡慧春、陈次青、唐弢等，担任过名誉顾问有顾颉刚，钱钟书，潘承弼等人，均为文界翘楚。^[13]

图书馆也很重视社会服务。图书馆不仅只事收藏，还要发挥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功能，传播知识，服务学者及大众。在征集文献的同时，图书馆对于所收藏的旧本秘籍，还进行编纂整理刊刻，“编纂目的，专为整理，不为新作，专为前贤形役，不为个人张目。”^[14]虽然经费极为紧张，但在张元济、顾廷龙的推动下，图书馆推出了“合众图书馆丛书”，分两辑共刊刻了十五种图书，均为珍藏秘本。兹列其书目如下：^[15]

(清)罗以智撰，叶景葵辑：《恬养斋文钞》四卷补遗一卷，据馆藏稿本，民国29年2月出版，铅字排印，二册，合众图书馆出资。

(清)陈骥德纂、顾廷龙辑：《吉云居书画录》二卷补遗一卷，据本馆抄本，民国31年12月版，一册，张元济题跋，李英年捐资。

(清)潘志万辑：《潘氏三松堂书画记》一卷，潘承弼补遗一卷，据本馆抄本，民国32年1月出版，一册，潘承弼题跋，李英年捐资。

(清)陈骥德辑：《吉云居书画续录》二卷，据本馆抄本，民国32年2版，书前有礼髡龕主人题识，礼髡龕主人捐资。

(清)王乃昭辑《李江州遗墨题跋》一卷，据馆藏手稿本，民国32年3月出版，潘承厚题跋，礼髡龕主人捐资。

(清)叶昌炽辑《朱参军画像题词》一卷，据本馆抄本，民国32年3月出版，潘承弼题跋，礼髡龕主人捐资。以上后两种合订为一册。

(清)徐坚撰《余冬琐录》二卷，据本馆抄本，民国32年4月出版，一册，顾廷龙题跋，礼髡龕主人捐资。

(清)许兆熊撰《凫舟话柄》一卷，据本馆抄本，民国32年5月出版，一册，顾廷龙题跋，礼髡龕主人捐资。

(清)张鸣珂撰《寒松阁题跋》一卷，据本馆抄本，民国32年5月出版，一册，潘承弼题跋，礼髡龕主人捐资。

丛书从1941-1948年，历时8年，分初集和二集。初集出版于1941-1945年，共14种，二集一种。丛书之中，多为珍本稀见，系从捐赠之中选出，于学术研究大有裨益。从上文可见，各相应书册均由捐资出版，亦说明图书馆的出版计划得到社会支持。顾廷龙在丛书编辑序言中说，“本馆丛书之辑，志在使先贤未刊之稿或刊而难得之作广其流传，顾非一馆之藏之力所克胜任，缘商同志谋集腋成裘之举。所选著述以捐资者之意趣为指归，各彰所好，各阐所宗。学海无涯，造诣不一，要其专治所学，发抒心得，必有足贡献于后来者，勿偏持门户，勿执一绳百，采撷英华，视读者之去取何如耳。”^[16]将私家珍藏进行出版，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学术的建设，图书馆在逐步实践其立馆之宗旨。

合众图书馆收藏古籍之丰，得到学者看重，“入藏中有清代名人秘稿甚多，如顾祖禹、张惠言、严可均等著述稿本，皆可订正通行本者，其他精槧之本，亦不少，嘉惠学者匪浅。”^[17]图书馆以历史文献作为收藏特色，确定其专业定位，珍本秘稿对于文史学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。同时，图书馆还广刊目录，使为公众知晓检阅，便利运用。《国内学术界消息》发文称，图书馆已设立筹备处，以利进行，“拟一面编纂目录，分卡片书本两种，以资在馆内外检阅之便。一面校印前贤未刊之稿，嘉惠后学，并广其传，所谓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也。”^[18]对图书馆保存文献、传播文化之举，颇为认同。据载，郭绍虞、钱锺书、周谷城、蔡尚思、周予同、黄永年、顾颉刚、郑振铎、陈寅恪、陈垣、胡适等文史名家均曾前往阅看，胡适还利用收藏中的《水经注》版本进行研究。^[19]作家冯其庸在1982年回忆，他在35年前在上海读书，除上课外，剩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合众图书馆看书，“有时我整天在图书馆，有时是半天在图书馆，当时我就是在撰写《蒋鹿潭年谱》的初稿。使我十分感谢的是我时时能得到顾老的指点和关照，我读的书，图书馆单给我存置一个书架，每天到后就取书阅读，不浪费一点时间。”^[20]在战火纷飞、时局动荡的环境之下，合众图书馆俨然成为一方难得的知识乐土，在为学者研究和普通读者服务方面均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三、结语

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，军事政治上的抗战至为关键。但战乱之时也是文化受创之时，创办图书馆，为保存中国文化、维护民族精神而立，也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壮举。在近代创立的众多私立图书馆，多秉持其文化信仰，作为立馆发展的宗旨与方向。合众图书馆以历史文献收藏为特色，以谋国故之保存为矢的，既是发起人与创设者的意旨，也是其赢得公众支持的重要原因。

作为私立图书馆，合众馆从创设到早期发展，充分体现出“众擎易举、各出所藏”的宗旨，在馆内形成良好的分工协作机制，在社会上建立起专业服务的公众信任机制。叶揆初、张元济及顾廷龙三位创办人志业相投，交谊笃厚，是合众馆的立馆之基。难得的是，三人都完美扮演着出资人、捐助人、管理人的角色，相辅相成，内外相维。在三人合作的格局下，图书馆的基本收藏和社会捐助也得到保证。图书馆还建立起专业的图书管理制度和服务机制，将为学者服务和公众服务作为其重要的公共职能。因此，学者们在运用其秘本珍本时，也充分肯定合众图书馆的服务水准，这对于确立图书馆的公众信任极为重要，许多图书及经济上的捐赠均由此而来。图书馆的创办需要资源，需要依赖于“众擎易举、各出所藏”的协作方式，但只有在专业水平与公众信任的基础上，图书馆才能厚植发展的根基，真正确立其专业的公共图书馆的地位。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的发展，较好诠释了资源筹集、专业服务与公众信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。

注释：

[1] 顾廷龙. 顾廷龙学述[M],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00: 133.

[2] 关于合众较早的研究可能是顾廷龙本人所写的《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概状》（《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发展史料二则》，《历史文献论丛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82页），后来顾陆续写过多篇回忆张元济、叶揆初的文章。关于创办人与合众图书馆之关系讨论最多，参见王京州、张永胜：《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》，《图书与情报》2006年第3期；王世伟：《合众图书馆创始考略》，《历史文献论丛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67页；王世伟：《合众图书馆的三位主要创办人》，第247页；沈津：《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》，《新世纪图书馆》2005年第4期；任雅君：《张元济与顾廷龙交谊述略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2009年第7期；王世伟：《论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》，《图书馆论坛》2007年第6期；邓云乡：《合众图书馆》，上海图书馆编：《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》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，第157页。从整体上看，合众图书馆之如何合众，还缺乏系统讨论。

[3] 历史文献论丛[M]. 上海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4：67.

[4] 历史文献[M]. 上海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1999，（1）：30.

-
- [5] 历史文献[M]. 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1999, (1): 31.
- [6] 上海图书馆. 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1999: 97.
- [7] 张元济. 教育救国论[M]. 北京: 高等教育出版社, 2010: 285.
- [8] 顾廷龙. 顾廷龙文集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02: 545.
- [9] 张元济. 张元济书札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81: 171.
- [10] 顾廷龙. 顾廷龙文集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02: 604.
- [11] 萧乾主编. 文苑佳话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1992: 142.
- [12] 上海合众图书馆之创设[J]. 图书季刊, 1940, (2): 269.
- [13] 王世伟. 图书馆服务标准论丛[M]. 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9: 253.
- [14] 顾廷龙. 顾廷龙文集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02: 604.
- [15] 白撞雨. 翕居读书录[M]. 北京: 石油工业出版社, 2009: 698.
- [16] 顾廷龙. 顾廷龙学述[M].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00: 133.
- [17] 上海合众图书馆之创设[J]. 图书季刊, 1940, (2): 269.
- [18] 容 媛. 上海合众图书馆筹备近况[J]. 国内学术界消息, 1940, (26): 265.
- [19] 王世伟. 图书馆服务标准论丛[M]. 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9: 252.
- [20] 王世伟. 图书馆服务标准论丛[M]. 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9: 252.